

#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Heje Nanai Ethnicity in Museums : A Case Study on the People of Geiker hala in the Aoqi Village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4-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佐々木, 史郎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5021/00008982">https://doi.org/10.15021/00008982</a>

## 博物馆中赫哲族 = 那乃的历史·文化表象 ——以敖其村的葛依克勒氏族人为例<sup>1)</su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Heje-Nanai Ethnicity in  
Museums: A Case Study on the People of Geiker hala in the Aoqi Village

佐佐木 史郎 (刘征宇译)

SASAKI Shiro

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unter-gather societies of Northeast Asia. More concretely, it analyzes the ethnography, a museum exhibition,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Nanai-Heje people of the Khabarovsk region in Russia and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China, to correlate the contents of the ethnography written by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logists with regional history and to establish a new historical-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is people.

In the paper, I analyze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Geiker hala, one of the clans of the Nanai-Heje people, and an exhibition at a museum in a Heje village named Aoqi, located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Sungari River near Jiamusu. This museum exhibit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clan, because its members founded the village. Based on this analysis, I discuss how to integrat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unter-gathers of Northeast Asia, and how to establish a more appropriate exhibition of their culture in ethnological and regional museums.

### 序言

本文以中国黑龙江省松花江沿岸的敖其赫哲族村中新建博物馆的展览为分析材料, 试图将广泛居住在黑龙江流域(主要为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其河口下游的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或那乃<sup>2)</sup>的文化表象和历史表象加以统合, 进而对文化人类学(以下简称为“人类学”)以及民族学中所谓历史研究方法与民族志内容间历时性的相对化问题加以讨论。作为此地域现代住民的文化上以及谱系上的祖先, 13世纪以来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所能获得的有关他们历史时代的生活、文化以及活动相关的知识, 与19世纪后期以来俄国、欧美、日本以及中国等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所残留的民族志和研究报告中对先住民文化的理解, 这两者间存在着极大的出入。笔者之所以抱有如此的问题意识, 正是基于上述两者间的不协调感。1990年代该地区对外国研究者

开放，使得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成为可能；伴随着正规调查的逐渐展开，这种不协调感，特别是对民族志内容的不协调感则变得越来越明显。

围绕着狩猎采集民的社会和文化解释以及其历史的诸问题，正如著名的卡拉哈里争论（围绕着分布于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那样的狩猎采集社会所产生的争论）所代表的那样，以欧美研究者所擅长的诸如非洲和北美等区域为中心逐渐展开。然而，笔者却认为，将如此的争论，置于这些研究者最不擅长的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东北部、远东俄罗斯南部以及日本列岛北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东北亚地区拥有世界上得天独厚的狩猎渔捞采集资源（在丰饶的森林以及流淌其间的河川湖沼中生存着的野生动物、鱼类以及有用植物），在此存在着许多具有多样文化的狩猎采集社会。不仅如此，中国、日本、朝鲜、满洲、蒙古以及俄国等存有文字记录的国家，从古代开始便保存着与他们相关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并且，这些文献从13世纪开始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至17世纪以后甚至达到可以对个人活动进行追踪的精确程度。这种历史性情报的质量、数量以及多样性，是引起欧美人类学者长期争论的非洲中南部和北美等地狩猎采集社会的相关记录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对东北亚地区的研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即，将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所描绘的与狩猎采集社会相关的民族志在时间轴上进行相对化处理，其所得到的模型在历时性的视点下可以进行比较并实现一般化。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一直以来将东北亚狩猎采集社会作为自己最擅长研究的俄国和苏联的人类学者以及民族学者当中，并不存在上述的那种研究观点。同时，与此相关的研究领域由西欧传到了日本，进而又从日本和西欧传到了中国，使得受此影响的这两国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采用这种研究观点<sup>3)</sup>。因此，本文所涉及的赫哲族、那乃的社会和文化，无论其是否属于那种值得采用历史视野研究的对象典型，尚没有研究者采用此观点对其进行相关民族志的撰写。

历史上许多民族志都将赫哲族、那乃描述为：以渔捞·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过着依赖于自然的生活，信奉萨满教和泛灵论，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生活在阶级以及阶级分化不是很发达的社会之中。特别是，在那些受进化主义影响很深的民族志中将他们明确地定义为：他们处于“未开化社会”、“未开化文化”，抑或是“原始社会”、“原始文化”之中，没有表示固有语言的书写体系（文字），并且没有历史，仍残留着最晚至金属器出现之前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和文化。进而，在俄罗斯1930年代以后以及中国1950年代以后，这些保持着“原始”、“未开化”状态的人们则被赋予了，在分别经历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划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政策后，向着社会主义社会飞奔、歌颂现代生活等这样的发展脉络。诚然，在近些年民族志中将他们冠以“未开化”、“原始”的形容越来越少了，但是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对于他们“历史”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浅薄的。

作为赫哲族、那乃在谱系和文化上可确证的祖先们，他们在13世纪以来的中国文献中屡见不鲜，特别是17世纪以后，氏族名甚至是人名已见于史料之中，使得我们能够从个人的层面来了解他们的具体活动情况。而且，其中所记载的祖先们的活动，明确的指出了他们曾经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晋升为地方驻军的将校级别者不在少数，甚至有极少数人位至官

廷高官。如此人才辈出的集团和文化为何被冠以“原始”、“未开化”的形容呢？从历史文献中获得的对他们社会、文化的印象与民族志中所体现的内容相差甚远，这种强烈的不协调感萦绕在笔者的脑中。

加之，自苏联即将解体的1990年起，笔者便开始对俄罗斯境内的赫哲族村落进行调查<sup>4)</sup>，在通过将他们家庭和博物馆中所保留的民具以及生活用具、仪式用具、传家宝或是他们对祖先功绩的述说等调查内容与史料分析中所获得的理解相对照后，其中一些内容是完全吻合的；史料所载内容在残留的实物与记忆中得到认证的同时，史料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也得以被人们所知晓。同时，对于他们自身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相对于民族志，其与史料中所获得的印象更为相近，关于这一点也可得到确认。

如此这样的研究通过各种名义上的黑龙江流域调查得以循序渐进；而另一方面，与中国境内赫哲族相关的调查机会却很难实现。然而，在2012年，作为科学研究补助金中部分研究项目的代表人，笔者获得了对中国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进行调查的机会；在获得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境内赫哲族现状的见闻和知识的同时，也得以获得了与笔者长期关注的跨境居住于中俄两国的葛依克勒氏社会集团（氏族集团）相关的最新资料。本文便以此材料为基础，尝试对人类学和民族学中历史研究、诸如赫哲族、那乃那样的先住民或少数民族的民族志以及博物馆中的文化表象等三者理想状态的相关思考内容加以论述。

本文通过以下构成部分加以论述。首先，就所谓赫哲族、那乃的民族概略以及如其所示的民族分类、组织结构的成立过程及其中所隐藏的问题等三方面进行评述，这也是使本文得以理解的预备知识。其次，在对文中考察材料来源的调查地——敖其村进行简单地介绍后，笔者再从中俄两方面入手对葛依克勒氏的来历进行了介绍。然后，对以葛依克勒氏族人的历史和文化为中心介绍赫哲族的敖其村博物馆的展示加以概括，并对历史展示与文化展示的理想状态以及历史认识与文化表象间的关联性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则对民族志记述内容的历时性相对化问题进行探究。由此，笔者想对遵循人类学与民族学时间轴的历时性研究所得的成果及其意义加以明示。

## 1. 赫哲族与那乃

人们将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赫哲族，与俄罗斯北部的先住民那乃视为同一个“民族”<sup>5)</sup>。在那乃语中确实存在着与“赫哲（Heje）”同词同义的词语，即“河川的下游”<sup>6)</sup>。而且，他们在生产形态、物质文化、社会构造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共通性<sup>7)</sup>；更为重要的是，在文献中得以确证的是，他们从17世纪初期以来便共享着相同的历史经历。

20世纪后期以来的“民族”概念，其主流的定义着重于所属民众的归属意识与文化认同，对语言与文化的同一性把握则逐渐淡化下来。基于此，在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逐渐成为开放的国家之后，赫哲族与那乃的交流便逐渐开展起来；同时，也展现出了他们试图确认并提高其作为同一民族的意识。

现代中俄国界的原型形成于1858年的《爱珲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在当时，从松花

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自黑龙江流域遍布着许多住民，而国界的产生使得他们分散于中俄两国之中。我们不能确定在上述流域的村落中居住着的人们是否曾经共有着所谓的同一个民族的意识。19世纪俄国民族学者 L. von Schrenck / Л. И. Шренкь 曾经这样认为：生活于自松花江上 Индамо 村落（现流入佳木斯市近郊的松花江支流音达木河，该村即在此河的河口附近）至乌苏里江兴凯湖周边、黑龙江下游的 Ади 村落（古代称为阿吉，其对岸是巨石耸立的阿吉山）间的人们共属于“金”（Golden/Гольды）民族。尽管生活于此的人们存在多种方言，并且在文化上存在许多差异，但是他还是将他们认定为同一民族（Шренкь 1883: 151-152）。这种观点在现今的研究者、行政机构以及当地住民间逐渐传承并固定下来。原本“那乃”一词在那乃语中意为“那边土地的人们”；然而，由于1930年代苏联政府所采用的“自称优先”的民族命名政策，使得“那乃”成为了“金”的代名词而普及开来。因此，“那乃”一词所指代的族群界限及其语言和文化均与“金”相同（图1）。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境内的所谓“赫哲族”，是1950年代中国政府在效仿苏联“民族识别工作”之时所认定的民族和名称。然而，在那之前，人们在对当地住民进行分类的时候，便已开始使用“赫哲族”这一名称和分类了。例如，1930年代人们便将松花江下游的住民称为“赫哲族”了，并且在凌纯声与赤松智城、泉靖一的民族志中均使用了这个名称（凌 1934；赤松、泉 1938）。此外，这种名称和分类亦可追溯到更早的清代时期。编纂于乾隆16年（1751）至乾隆26年（1761）间的《职贡图》（刊本名为《皇清职贡图》），是一本对当时与清王朝进行朝贡或交易的国内外异文化集团的文化特质进行简要总结的图解史料，在其第三卷出现了“赫哲”一词——作为东北地方的一个集团（傅 1761[1991]: 254-256）。所谓“赫哲”或“Heje”这一名称和分



图1 东北亚河敖其村的位置

类可以上溯至17世纪后期；在当时亦用“黑金”、“黑津”等词来代替<sup>8)</sup>。然而，始于1650年代的史料中所出现的这些词语，其所指代的族群范围与现代的赫哲族并不一致。当时所用词语的含义以及其所指代的族群在至今350多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多样的变化。尽管当时的分类原则遵循着一定程度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但是其与近现代所谓的“民族”概念完全不同。关于这一论题笔者曾做过一些论述（佐佐木 1994: 263-288; 2001: 1-78; 2011: 178-211）。简而言之的话，所谓清代的“赫哲”（Heje）指的是：对清朝比较忠诚的毛皮贡纳民（“东北边民”），他们虽然没有编入满洲八旗之列，但是具有八旗预备军的特征。事实上，被称为“赫哲”的人们也曾几度编入满洲八旗的行列<sup>9)</sup>。然而，同属于毛皮贡纳民的“费雅喀”（Fiyaka）、“奇勒而”（Kiler）以及“库页”（Kuye）等民众，他们的独立性很高，并且从未入编过满洲八旗。在那之后，这个所谓的“赫哲”一词便用于限定那些清朝瓦解之后，在松花江下游以渔业和狩猎为生的特定人群，并被采用在中国政府所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之中了。

现在的民族区分是由国家层面所进行的，因此在那乃与赫哲族之间横亘着国家的界限。然而，清代赫哲族所指的住民范围并不是以国界为定的，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关于“赫哲”所指代的集团范围的详细变迁笔者准备另稿说明，其涉及到17世纪后期清俄间关于黑龙江领属问题的武力纷争，以及与此相关的18世纪前期清朝的八旗编制等问题。这种变迁体现了住民的移住情况；另一方面，它还反映了清朝支配势力的扩张情况。也就是说，这其中反映了文档编纂者在进行住民分类时所观察到的文化要素的分布，以及他们所处行政地位的异同与变化。例如，18世纪杨宾认定的剃发黑金与不剃发黑金（杨宾 1985: 251）以及19世纪曹廷杰认定的短毛子与长毛子（曹 1885[1985]），此二人都以剃发与否来进行区分；然而，他们所划分出的区域却相差甚远，后者的划分对象扩大至相距前者甚远的下游地区。然而，我们并不能将“短毛子”视为居住范围已扩大至下游地区的“剃发黑金”，它只不过是满洲辫发的流行使得曾经的“不剃发黑金”开始剃发的一种表象而已<sup>10)</sup>。

另外，作为此地区原始的语言和物质文化，其文化要素的分布范围大不相同；因此，文化要素的着眼点不同，其所产生的集团分类的界线也不尽相同。再加上，如将语言和文化总体而视之的话，它也是在连续变化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自松花江及乌苏里江至黑龙江河口的区域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文化连续体（佐佐木 2001: 1-78; 2011: 178-211）。而且，与其说是这三大河流决定了集团和文化的界限的话，还不如说是在其两岸分布着相同的集团和文化（佐佐木 2013: 35-38）。

19世纪后期这个文化连续体被国界分开，而该地的人们在此后的150年间则踏上了不同的历史进程。在此，我们便产生了以下几个疑问：他们中所保有的民族意识是由于持续越境联系而产生的对同一“民族”集团的彼此归属感吗？抑或是，因这150年间通信断绝而早已消亡的民族意识，在研究者们“应当同族”的主张下重燃了呢？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即使在彼此不相联系的情况下，邻境之国也会有同族之人；就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有一群人，他们相信在彼国有着自己的亲属。本文中介绍的葛依克勒氏民族就是其中一例。近几年，这个集团中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村

子里，修建了展示本村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从这些展览中，参观者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如何掌握和理解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的。因此，本文便从博物馆的展示出发，解读赫哲族的文化表象方法和历史意识，并结合民族学博物馆的文化展示对其未来的发展加以思考尝试。

## 2. 调查地概要

作为研究项目的代表者（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 A（海外学术调查 21251013号）《俄罗斯极东森林地区中文化的环境适应》2009年~2012年），笔者于2012年9月9日至19日对中国黑龙江省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中被称为“赫哲族”的少数民族集落的概况进行了调查。该调查是由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三国的民族学者和考古学者所参加的国际共同调查；同时，分属于中国赫哲族与俄罗斯那乃研究者们的参加则使得本次调查具备了重大的意义<sup>11)</sup>。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在佳木斯、街津口、八岔、抚远、抓吉、海清、饶河、四排以及敖其等各城市和乡村中，对赫哲族出身的人群进行了采访，并对当地博物馆所展示的资料进行了详细地调查。适逢“九一八事变”<sup>12)</sup>纪念日及钓鱼岛问题所导致的反日游行在全国各地频繁出现，使得我们的调查之行受到了若干影响。然而，所幸的是，由于本次调查为赫哲族与那乃出身的研究者参与的国际学术调查，使其所受的影响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抑制；因此在短短的十天之中我们收获颇丰。

在稍后的报告中，笔者将聚焦于本次调查的最后访问地——敖其村，并尝试对博物馆中民族文化的展示和表象方法、赫哲族自身的历史意识以及研究者对其研究的方法论等诸问题进行讨论。之所以对该村如此关心，是因为笔者了解到自己深感兴趣的葛依克勒氏（葛依克勒氏，在中国亦称葛姓）族人的一部居住于此。正如后续所述那样，他们是这样的一群跨境之族：在记录17世纪满洲国家（Manju gurun、即后来的清朝）兴盛时代的《满文老档》中便早已出现；在拥有如此古老历史的同时，其众多族人还居住于俄罗斯境内。关于他们的来历，笔者在1991年和94年中撰写了与俄属葛依克勒氏相关的文章（佐佐木 1991: 36-56; 1994: 263-288），然而始终没有获得与中国境内该族动向相关的情报。由于本次调查中获得了中国境内该族的最新情报，笔者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审视。

敖其村隶属于佳木斯市（图1），村内的赫哲族共计103户、326人（参照2008年统计数字及敖其村村长所提供的信息）。该村位于佳木斯市市区以西20公里的松花江右岸之上；近年来在少数民族生活改善以及观光化增收的目的驱动下，崭新的赫哲族村落（观光村落）正在逐渐建设之中。同时，介绍该村赫哲族文化与历史的博物馆也在当地建设落成。本文便是围绕着该博物馆中历史和文化的展示而做的考察，然而在那之前先让我们对生活在该村的赫哲族、葛依克勒氏进行相关的介绍吧。

### 3. 葛依克勒氏的经历

所谓“哈拉”（满语为 *hala*，那乃语为 *хала*）就是以满族、赫哲族及那乃为首的东北亚满洲—通古斯系诸民族中常见的父系单系血缘集团。相当于日语中的“氏”（ウジ）或氏族（人们认为该词与日语中的ハラカラ、ウカラ和ヤカラ等词有相同的词根）。类似的词语中亦有“莫昆”（满语为 *mukūn*，那乃语为 *мукун*）一词，通常情况下其为哈拉的下级组织或下属集团。哈拉拥有类似于“葛依克勒”那样的独特名称，并遵循父传子的继承原则。因此，继承相同哈拉名的人们被认为是相同哈拉中的一员。然而，在拥有古老历史的哈拉中，因彼此间无法确认谱系关系而相互分散着的成员亦不在少数。不仅存在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共承同一哈拉名的情况，也存在着近代以后跨居于多个地域集团或民族间的哈拉集团。另外，赫哲族和那乃中人口最多的毕日迪（毕日达奇）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当时，不管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亲族关系，同村居住的人们就被清朝官员行政式地划归为“毕日迪”哈拉，并改姓为毕日迪（1990年笔者在 *Dayerga* 亲自调查所得）。尽管葛依克勒氏历史悠久且包含人群广泛，但是其成员坚信彼此间存在着相互的谱系关系。

关于该姓的来历，我们可以从民国时期编纂的地方志《依兰县志》“人物门世族”条目中得到大致的了解（杨步犀 1974: 147-148）。据该文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末17世纪初），有一位称为“尼雅胡图”的人以“德新”村为中心开始了其势力的扩张，其孙索索库被推举为三姓地区（今哈尔滨市依兰镇）至乌扎拉地区（尽管具体位置不明，可能位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河地区）的“总部长”，至清代开始担任“国伦达”一职。由此，资料中记载着该族从初代至13代间的简单谱系和事迹。然而，关于其早期的时代记述尚无其他资料可以加以印证。

关于该姓来历的历史学证据始于17世纪初期。清朝初期的记录《满文老档》第四卷（太宗1）“1628年（天聪2年）正月”中载到：“二十六日，东方格伊克里部落四头目率四十人来朝，赐宴，立赐衣各一袭”（满文老档研究会 1959: 116）<sup>13</sup>。这即是葛依克勒氏在历史上的初次登场。7年之后的1635年（天聪9年）正月，该族首长“索琐科”现身于朝贡之列。该“索琐科”应该就是《依兰县志》“人物门世族”中所载的“索索库”。在此之后，该姓族人分别于1637年（崇德2年）2月、38年（崇德3年）11月、40年（崇德5年）正月、41年（崇德6年）12月以及43年（崇德8年）2月相继来朝觐见，相关信息见于记载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太宗）统治的官方记录《清实录》（太宗实录）之中<sup>14</sup>。

索索库后的第二代库里哈，由于在1643至1689年间清俄两国围绕黑龙江流域的势力纷争中其为清朝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为人们所熟知。关于他的活动情况在称为《清实录》和《礼科史书》的档案中可窥见一斑；特别是据后者所载，1653年（顺治10年），他从乌苏里江流地下游的被称为“使犬部”<sup>15</sup>的十姓之人（与葛依克勒氏相同的集团）那里收集作为纳贡品的黑貂皮毛，并率领该地首领前往宁古塔<sup>16</sup>、甚至盛京<sup>17</sup>等地向清廷宣誓效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81: 2-7; 佐佐木 1998: 689-690）。在此前的一年1652年，清朝对E·哈巴罗夫所率领建立的沙俄哥萨克据点阿枪要塞（阿穆尔河左岸博隆湖出口附近，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河地区）进攻



失利（ДАИ том3 1848: 365-366;《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1985: 537），使得其周边住民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在当时的情况下，葛依克勒氏的首领能够成功招揽要塞周边住民臣服清廷，从清朝的角度来看实属大功一件。

《依兰县志》中所载索库库的后代将势力移至三姓地区——今哈尔滨市依兰镇一带（《依兰县志》1921: 147），历史学所能够证实的时限大致始于库里哈任首领的时代（松浦 2006: 314）。在此之后，其子札哈拉时期，部分族人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列。据清末编纂的《吉林通志》（卷六五）所载，札哈拉于1714年（康熙53年）被任命为刚成立不久的三姓驻防八旗的正黄旗佐领（满语称为 *niru janggin*，统领包含将校、兵丁及后方支援要员等300名成年男子的集团，以及他们的家族、随从等大批人群）（长顺 《吉林通志》1930: 1032）。而且，他还获得了可子孙世代相袭的“世管佐领”的地位（参照三姓驻防八旗正黄旗世管佐领一览表）。在当时，除葛依克勒氏以外，原先生活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以及松花江下游的“努业勒（*Luyara hala*）”、“柎什哈里（*Hūsihari hala*）”及“舒穆鲁（*Šumur hala*）”等三姓族人分别组建成镶黄旗、正白旗和正红旗的牛录，他们各自的首领被任命为世管佐领之职（长顺 1930: 1032）。顺带而言，依兰镇旧称“三姓（满语为 *Ilan hala*）”，其所指的三姓即是葛依克勒、努业勒和柎什哈里。除去舒穆鲁的该三姓族人，组成被称为“上三旗”的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并且他们的首领任佐领之职。由此，其在三姓驻防八旗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表）。

表 三姓正黄旗世管佐领一览表（葛依克勒氏世袭佐领）

	人名	在任期间(年号)	在任期间(公元)	父子关系	备考
1	札哈拉	康熙53~58	1714~1719	喀里哈之子	「由德新赫哲部落葛依克勒氏哈尔达编入，任世管」《吉林通志》1930 [1986]: 1032。
2	阿穆奇喀	康熙58~雍正9	1719~1731	札哈拉之子	《依兰县志》中称阿玛奇喀。「雍正九年、特旨派招抚霍尔佛阔八姓人丁归旗当差着有勤劳、奉旨赏穿黄马褂留京充一等侍卫」(依兰县志 1921 [1974]: 148)。
3	杜尔郊	雍正9~乾隆14	1731~1749	阿穆奇喀之子	《三姓档案》中，正黄旗骁骑校 <i>Ibugene</i> 的上司
4	伯都	乾隆14~15	1749~1750	杜尔郊之子	乾隆15年罢免。
5	董萨那	乾隆15~28	1750~1763	阿穆奇喀之子	《赫哲族简史》中，其父为阿木奇卡。阿木奇卡和阿穆奇喀或阿玛奇喀可能是同一人物。
6	六十七	乾隆28~56	1763~1791	董萨那之子	
7	西郎阿	乾隆56~58	1791~1793	六十七之子	
8	嘎尔善	乾隆58~嘉庆7	1793~1802	西郎阿之子	
9	玛尔洪	嘉庆7~17	1802~1812	嘎尔善之子	
10	西勒胡兰	嘉庆17~24	1812~1819	玛尔洪之子	
11	富珠哩	嘉庆24~道光21	1819~1841	西勒胡兰之子	
12	庆思	道光21~咸丰元	1841~1851	富珠哩之子	
13	庆恩	咸丰元~光绪元	1851~1874	富珠哩之子	
14	讷苏肯	光绪元~11	1874~1884	庆恩之子	

此表为笔者根据历史文献《吉林通志》(1930 [1986]: 1032-1041) 所制。

据《依兰县志》所载，札哈拉的子孙中官拜宫廷一等待卫的人才辈出。例如，札哈拉的儿子阿玛奇喀（《吉林通志》中为阿穆奇喀）于1731年（雍正9年）受命前往七姓地方<sup>18)</sup>，为满洲八旗的编成而进行调查。之后，由于其功绩为朝廷所认可，进而官拜一等待卫<sup>19)</sup>。据说在清朝末期，其族第十二代富明阿担任三姓协领（协领，满语称 *gusa i da*，属三姓官署副都统衙门中副都统的次级官职）一职，另外他的同族全亮曾是最后一位三姓副都统（所谓副都统，即满语中的 *meiren i janggan*，是三姓副都统衙门的长官）（杨步犀 1974: 148）。我们在敖其村的博物馆中找到了关于全亮的十分有趣的解说。在该馆的二楼陈列着介绍该村及其周边地区赫哲族出身的名人履历的展示板，而其中将称为“葛依克勒·全亮（1847—1922）”的人物与葛依克勒氏的始祖尼雅胡图和索索库（尼雅胡图与索索库的事迹介绍与《依兰县志》所载几乎一致）等人并列在一起进行了介绍。此人即是《依兰县志》中出现的全亮。相关记述为“三姓副都统。祖居乌苏里江口的德新部落，始祖为尼雅胡图。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人们为表彰他的御敌功绩，赠送‘望重东陲’的匾额，悬于私邸。”而且，他在沙俄入侵中国东北之时奋勇抗击并身负重伤（照片1）。

在抵御沙俄入侵的人物中，名叫“舒连喜（？—1900）”的人亦在介绍之列。展示板上是这样介绍的：“世管佐领兼三姓练马步营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沙俄企图独占东北，舒连喜率众阻击敌人，壮烈殉职。死后清廷恤赠云骑尉职世袭，其灵牌后供祀于昭忠祠内。”1899年至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沙俄侵略东北等严峻事态相继而出，在当时他作为佐领将校率兵御敌而不幸殉国。使“全亮负伤”、“舒连喜战死”的中俄之战，其相关记载散见于《依兰县志》“政治门兵事”之中。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俄人入寇轮船数十艘。至依城东北白哈达一带……先是护理副都统依英阿、派统领全亮。左司左领英林。营总佐领连喜。会同



照片1 全亮、舒连喜相关记述说明。作者摄于敖其村博物馆内。2012年。

金矿总办宋春鳌。共率兵勇三百余名。扎于倭和江（即倭肯河江乃古名也）右岸相距仅里许。该统领等虽奋勇于枪林弹雨之中。究因寡不敌众。枪炮不精。阵亡八十余名……”（杨步犀 1974: 51-52）由此可知，在1900年（光绪26年）沙俄入侵之时，全亮与舒连喜参与了松花江流域三姓近郊的抗俄战争。此役全亮负伤、舒连喜殉国（然而，无论是在《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还是《三姓档案》中，我们都没有发现与此战役相吻合的描述）。全亮成为最后的三姓副都统之时已是1909年（宣统元年），这也许是对他当时奋勇杀敌的褒奖吧。如果舒连喜姓舒的话，那么他应该属于舒穆鲁氏族人。他或许就是与葛依克勒氏共同编入满洲八旗时，成为正红旗世管佐领的实力出众的舒穆鲁氏族人的子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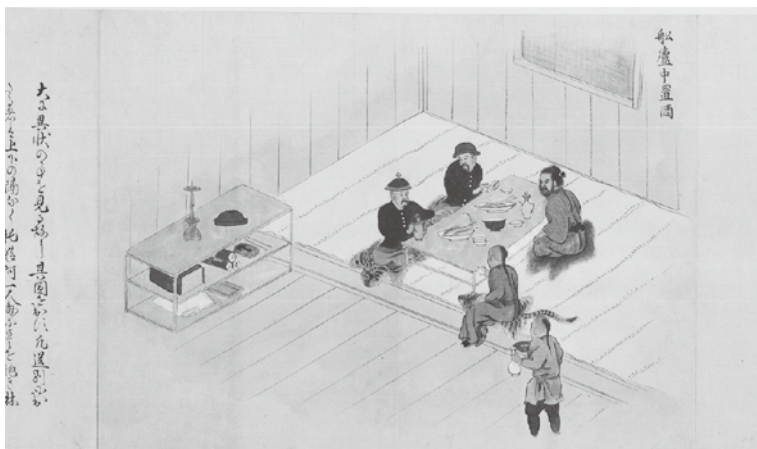
在三姓副都统衙门废止、依兰县设立之后，依附于副都统衙门和正黄旗等八旗组织的葛依克勒氏族人便离开了三姓地区，最后在相距不远的桦川县敖其安居下来。据该村博物馆的展板所示，由于该地风光明媚，他们将其命名为“敖其”——即赫哲语中的“操罗子”之意。

然而，日军的入侵再度打破了他们短暂的安宁之日。博物馆的展板中介绍了“葛魁祥（1894-1936）”这个人物。由于其姓葛，故应为葛依克勒氏。对其的说明如下：“赫哲族族长。1894年生于敖其村，曾担任部族长。1936年，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日寇派特务暗杀了他，牺牲时年仅42岁。”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正式开始了对东北的侵略；他作为当地的族长在指导抵抗运动之时，于1936年为日本特务机关所暗杀。

除此之外，出身于葛依克勒氏、并在历史资料中出现过的人物，分别为《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8年（1743年）2月29日付文所载的正黄旗骁骑校 Ibugene，以及由间宫林藏口述、村上祐助笔记而成的《东鞑地方纪行》中所录的拨勒浑阿。前者是葛依克勒氏族长（当时佐领的第三代杜而郊）三姓驻防正黄旗世管佐领下属的骁骑校（骁骑校，满语为 funde bošokū，相当于佐领的副官），因此很有可能是葛依克勒氏族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翌年、即1690年（康熙29年），清朝实现了对费雅喀人（相当于今尼夫赫人和乌尔奇人的祖先）的统治，自那时起，由于其精通费雅喀语（推定为尼夫赫语）、鄂伦春语（推定为鄂罗克或鄂温克语）及满语，他一生中38次前往库页岛，为清朝在库页岛的管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 1984: 132）。

后者则是日本人曾经遇到过的为数不多的葛依克勒氏族人。1809年从库页岛前往黑龙江的间宫林藏探险至德楞的“满洲府”（即当时的“满洲行署”——译者注）。当时，他在德楞所会见的三位“上管夷”中的一人正是时任葛姓（葛依克勒氏）镶红旗骁骑校一职的拨勒浑阿。此人在三人中位居第二位；当时地位最高的是正红旗世管佐领舒姓（舒穆鲁氏）族人托精阿<sup>20</sup>，而居末位的是任正白旗笔帖式（满语音为 bithesi，表“文书”之意）一职的鲁姓（努业勒氏）族人沃勒恒阿。间宫林藏所见到的这三名上等官员均出身于源自三姓地区的氏族集团。林藏在他们的乘船中接受了酒席的款待。可能是因为该地使用汉文书，使得林藏误认为自己来到了中国的内陆地区（间宫 1810 [1985]: 136-147）（照片2）。

如此，葛依克勒氏族人自清朝兴盛之时便已登场，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大展身手，其许多族人名存史册。尽管仍存在着这样的分歧，即他们到底属于赫哲族、那乃还是满族（清代时期将被



照片2 德楞的满洲官员在船中接待。左端带红色帽子的人就是拔勒浑阿。  
出自间宫林蔵的「東韃地方紀行」中卷（間宮 1810[1985]: 136-147）。

编入满洲八旗的赫哲族称为新满族 Ice manju）（佐佐木 1994: 263-288）；但是，至少他们与在中国、俄罗斯以及日本所介绍的赫哲族或那乃民族志中时常出现的“未开化的狩猎渔猎民族”的形象完全不符。在后文中，我们将结合博物馆的展示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 4. 葛依克勒氏的另一部分族人

葛依克勒氏并不仅存在于中国境内。笔者最先见到的是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该姓族人。现在，他们被看作是“那乃”民族的一员。笔者分别在阿穆尔共青城和 Nizhnie · Khalbi 的 Нижние Халби 地区见到过他们；前者是大城市且有许多从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村庄涌入的外来者，而后者则是以那乃为主要居民的村落。两者作为那乃的居住地区均属于下游地区。尽管1960年开始的村落统合使得葛依克勒氏族人集中于上述两个地方，但是此前时期里他们则分散生活于多个村落之中。

曾经对俄罗斯境内那乃的文化、社会进行过详细调查的 A. В. Смоляк 认为，葛依克勒氏在其形成过程中属于比较均质的集团。她还认为，该集团从19世纪中期至末期时，曾存在于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诸地（Писсой 及 Хоми 等地）、阿纽伊河流域及其河口附近（Дада 及 Ерга 等地）等地。然而，下游地区居住的集团认为自己是来自阿纽伊河的移民（Смоляк 1975: 129）。支持这一信息的证据是，1897年所施行的第一次沙俄帝国国情调查。对其调查结果进行过总结的 С. Патканов 指出：在当时声称属于该族的回答者有238人（男132人、女106人），其中，居住在 Хоми、Ади 及 Писсой 等阿穆尔河下游村庄的有131人（男68、女63），Дасрга、Ерга 及 Дада 等比较上游区域的有72人（男48、女24），而注入上流右岸的支流阿纽伊河有18人（男女各9人）（Патканов 1906: 61）。并且，来自阿纽伊河流域的18人中，有10位是来自 Сара 或 Сира 的居民。

该村原本是更大的一个村落，甚至出现在18世纪末期三姓副都统衙门的档案之中。其中含有该官署所掌握的来自阿穆尔河流域和库页岛地区的毛皮贡纳者的一览表，其中残存下来的有：与库页岛相关的有4份，历时自1743年（乾隆4年）至1777年（乾隆42年）；而包含阿穆尔河流域的整个地区的一览表有12份，历时自1791年（乾隆56年）至1873年（同治12年）。在这些表中残留着这样的记录：葛依克勒氏 Sira gašan (gašan, 即满语中的“村”) 中有15户（代表者为穿袍人 Tullhina）和16户（代表者为村长 Lioge 和穿袍人 Kila）分别贡纳15和16张黑貂毛皮并获得了相应的群体恩赏<sup>21)</sup>。此份记录在1791至1873年间基本没有改变，这虽然是官员不加考证的机械记录，但是我们将其想象成乾隆年间比较近乎实际的状态。这里所记载的 Sira gašan 就是俄罗斯境内的 Саpa (或称 Сира)。19世纪末期这个仅剩十名村民的村落，与其一百年前拥有31户黑貂毛皮贡纳民时一样，生活着村长1名、穿袍人2名。31户仅仅是献纳毛皮的人家数，因此其村最盛时期的实际户数应该会更更多的。而此地之外的葛依克勒氏族人并没有出现在三姓档案之中。

由此可以想象到的是，向三姓周边区域移动的葛依克勒氏的部分族人，他们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进入阿纽伊河，并于18世纪中期以 Sira gašan 为中心定居下来。然而，由于该地区变得越发难以居住，他们便离开阿穆尔河本流向更下游的地方移动。但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时代移至阿纽伊河进而又迁出的？或者，是否存在这样的族人，即他们没有在阿纽伊河畔聚居，而是直接前往下游地区，同时这又是何时出现的？等等这些，谜团甚多。

笔者在对 Nizhnie · Khalbi 进行调查（1990、1997、1998）的时候，曾询问过这些居住在下游的葛依克勒氏族人，原先住在松花江（Sungari）流域的他们是什么时候移居到下游的。然而，居住在下游的这些族人却已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了。例如，在 Nizhnie · Khalbi 的下游右岸有一个名为 Ади 的地方。那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比较大的村落，现今 Nizhnie · Khalbi 的葛依克勒氏族人基本上是来自于此。1897年的国情调查显示：该村中有41名男性和45名女性、共计86人声称自己是“金”人（那乃）；而其中的全部男性和41名女性、共计82人是葛依克勒氏族人（Патканов 1912: 961; 968）。也就是说，该村是阿穆尔河下游葛依克勒氏族人的一大据点<sup>22)</sup>。

现在该村已经废弃无人居住。然而，在现今 Nizhnie · Khalbi 生活着的该族子孙们当中，仍然流传着 Ади 对岸巨石的相关传说。该巨石在19世纪亦为中国人所知晓，1885年（光绪11年）对当时已被沙俄占领的阿穆尔河流域进行过秘密调查的曹廷杰，称其为“阿吉大山”并加以标注（曹 1885）（照片3）。

另外，1854至56年沿清属阿穆尔河流域进行民族调查的 Шренкь 将该村描述为金、即那乃的最下游的村落（Шренкь 1883）。1897年时，亦有82位葛依克勒氏族人的来此定居，并将成为该地地标的巨石与他们自己的传说结合了起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充分地认为：在 Шренкь 进行调查的19世纪中期该姓族人便已在此地定居下来了。也就是说，16世纪末期兴隆于乌苏里江河口附近的“德新”村、并逐渐将其势力扩展到阿穆尔河中游至松花江流域的葛依克勒氏族人，至19世纪中叶时期他们分别占据了那乃、赫哲族分布的最上游地区（三姓）和最下游地区（Ади）。如此一来，在这片那乃势力范围两端生活着的人们实际上是共属同族的吧。



照片3 阿吉对岸的巨石。2001年作者摄。

在1990年代所作的调查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确认，即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葛依克勒氏族人是从松花江地区移居而来的。另一方面，2012年在敖其村所作的调查中，我们从该村葛依克勒氏村长那里也了解到，在他们的氏族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曾移居至下游地区。据他所说，曾经有兄弟8人，其中5人留居松花江，另3人则顺江而下至下游地区（留居松花江的5位兄弟中，有4人的子孙们至今仍居住在以敖其为中心的中国境内）。从而与我们在Nizhnie·Khalbi所了解到的信息完全吻合。然而，关于其时代，无论怎样我们也不得而知。留居松花江沿岸的族人采用满族和汉族的族谱传统，在1906年（光绪32年）制作出了非常精巧的本族族谱（葛氏家谱）。如果我们能够据此来确认他们祖先姓名的话，应该能够掌握那些移居至下游地区的族人所在的位置吧。然而，在那些沿江而下、生活于沙俄、苏联及俄罗斯联邦的人们当中并没有编写族谱的习惯。祖先的名字只存在于记忆和传说之中，因此他们在沙俄及苏联100多年的统治中基本上已荡然无存。也正因为如此，对两者传承的文史印证也存在着相当的困难。

## 5. 敖其村的博物馆

敖其村博物馆正名为“中国·佳木斯赫哲族文化博物馆”，位于其观光村之内，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现代建筑（照片4）。该建筑中有名为“佳木斯市郊区敖其村赫哲族鱼皮技术工艺传习所”及“佳木斯市郊区敖其村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的看板，另外还建有与博物馆相连的仪式用建筑。由此可见，这里是为了举行赫哲族传统文化实践及后代传承等活动所修建的。

鱼皮虽然是传统的服装材料，但是现在也用来制作那些体现独特风情的钱包卡包、小挎包、皮包及收纳包等实用制品。另外，一种被称为“鱼皮画”的剪贴画正以艺术作品的姿态成熟起来，其中不仅有表现狩猎、渔捞风景及岁时记或“儿童嬉闹”等民族传统的作品，还有很多满足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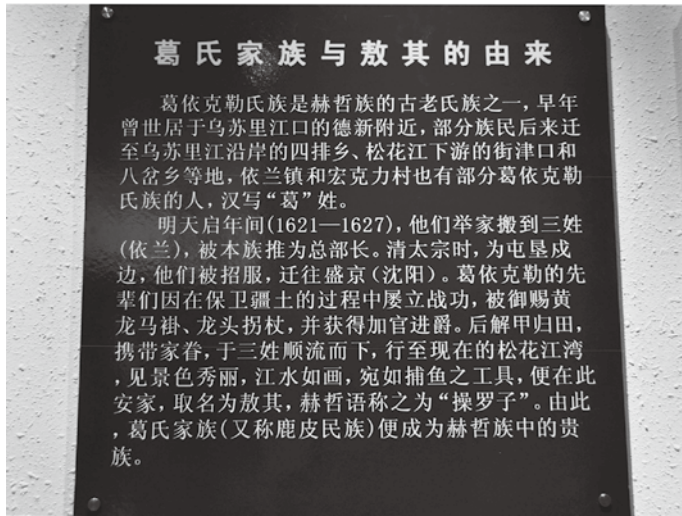
照片 4 佳木斯市郊区敖其村博物馆。作者摄于 2012年。

国内游客需求的、绘有龙虎、凤凰以及中国神仙英雄等形象的作品。由此，用于制作鱼皮皮革作品的技术和技能也得到了大力的开发和继承。所谓伊玛堪 (imakan, 阿穆尔方言中称为 нингма), 是含有独特押韵形式的口碑文学<sup>23)</sup>。由于它入选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作为赫哲族音乐文化和口头传承的普及和后继者培养等便逐渐兴盛起来。该博物馆中为传授上述两种技能所建的设施, 正是该村将鱼皮和伊玛堪作为赫哲族典型文化加以振兴、发展旅游事业的具体表现。

在博物馆入口处的中央区分别陈列着描绘满载而归的猎人形象和反映结婚仪式风景的画作, 展览则分布其四周。正如近年来在中国少数民族相关博物馆中所看到的那样, 该展览也是由历史展示和文化展示所构成的。

在展览中, 首先以赫哲族史前时代至现代的历史展示为开端。由于该村为葛依克勒氏族人的村落, 所以展览是以该氏族的历史为中心加以展现的。所展年表是普通的东北地区历史表, 而在它的旁边则是“葛氏家谱与敖其由来”专区, 其间陈列着葛依克勒氏的概要说明及其家谱的照片, 以及据家谱所制的系谱图(照片5)。历史展示同样分布在博物馆的二楼, 其中并排陈列着出身于葛依克勒氏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与敖其村有关的葛依克勒氏知名人物(例如伊玛堪名人吴明新)的传记。

文化展示部分也分布于博物馆的一层和二层。一层展示部分分为生活习俗和信仰两大部分, 前者陈列的是传统服装类、狩猎渔捞用具以及零碎工具等展品, 后者则是与萨满教相关的资料、木偶类及占卜用具等。在二层同样有生活用具类的展览, 展示着渔捞具(鱼网、“操罗子”及鱼钩等)及狩猎具(弓矢、矛、索套类及猎枪等)等用具, 还设有陈列着模型船和鱼标本的“鱼产品交易”专区, 并且还有现代工艺专区。该专区内不仅陈列着分别称为“鱼皮文化”和“桦皮文



照片 5 葛氏家谱与敖其由来。作者摄于 2012年。

化”的鱼皮及白桦树皮制品，还展示着传统服装中所使用的刺绣以及刺绣样式的剪贴画作品。(照片 6、7)

这样的文化展览结构，与我们在俄罗斯北方先住民村落博物馆中所看到的大致相同。然而，该馆所展示的基本上都是新资料，其中有很多是为博物馆开馆而制作的展示资料。将较于在俄方



照片 6 一楼的生活习俗展览。作者摄于 2012年。





照片 7 二楼的鱼皮画展览。作者摄于 2012年。

常能见到的19世纪以来的资料，该馆则十分少见。这可能与中国19世纪末以来时常出现的破坏古老、传统事物的事件有关。在当时，俄罗斯处于革命后混乱所引来的以日本为首的列强干涉（1917~21年）、斯大林时代强权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与肃清、镇压运动（特别是19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等混乱时代；并且，许多男性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殒命欧洲。然而，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住民除了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以外并没有卷入到战乱之中，其19世纪以来的资料也没有大量散佚。基于此，博物馆便能收集到保存着更多传统色彩的资料。它们也是苏联政府急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下，住民们不再需要的物品。然而，如果从稍显刁难的观点来看，博物馆以“学术”的名义从住民那里收集资料的情况并不是不存在的。尤其是，我们不能否认这样情况的存在：即那些与萨满教或信仰相关的资料，它们被以“迷信”、“旧的陋习”等名义从人民那里收取而来，并被隔离在博物馆之内。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则经历了沙俄、日本入侵与强制移民、国共内战及之后的动荡期，再加上著名的文化破坏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时期，使得那些古旧资料难以保存下来。另外，相对于苏联，其生活现代化及社会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化过程更为缓慢，便出现了直至现代传统生活用具仍在使用的情况。由此，比仍处使用中的传统生活用具更新物品便收藏于博物馆之中了。然而，起步较晚的中国在现代其经济增长显著、资金也逐渐丰厚起来；博物馆设施的新建、展示

中的新尝试亦随处可见。

利用鱼皮和白桦树皮等传统素材制作的工艺品以及饰有传统纹样的服装等民族艺术品，这样的展示在俄罗斯的博物馆中也可见到。近些年的俄罗斯，从民族学博物馆总部的俄罗斯民族学博物馆和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通称 Kunstkamera、两者均在圣彼得堡）至先住民村落的博物馆，它们都收集民族艺术作品和民族工艺品并将其运用到展览之中。近年来，先住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振兴所产生的运动和活动连锁展开，而博物馆则处于其中心地位。

然而，在村落工艺师和艺术家的待遇以及与市场需求相应的作品宣传和销路开拓等方面，中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对其产生影响的则是国家经济状态和人民商业活动的意识和意欲的差异。俄罗斯极东地区的先住少数民族的民族艺术，其知名度在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都市并不是很高。由此，依靠销售作品或租借展示等所得的收入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生活。尽管其中特别优秀的作家可以获得欧美的资助而活跃于海外，但是不能获得资助的人们则处于这样的现状：即通过村中狩猎、渔业及菜园农业等手段实现食料自给、依靠村落所发放的微薄的补助金和养老金（高龄者的话）来维持生计的同时，勉强维持着自己的发展。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国“鱼皮画”这种艺术种类已经确立，并且通过出色的宣传战略其知名度在中国国内持续增高。制作者也不仅仅局限于赫哲族的传统题材，而且还积极于制作那些能够引起顾客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族所喜爱的题材（描绘龙、虎及凤凰等吉祥动物以及说传中有名将等作品亦有很多）的作品。在经济增长使普通百姓也能享受观光旅行的今天，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被视为极好的观光资源，作为当地土特产品的以鱼皮画为首的传统工艺品销路甚好。这恐怕也是与对待“少数民族”及先住民族的国民意识差异有关；这也与下文所示的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认识和意识有关。

## 6. 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认识与展示的诸问题

敖其村博物馆所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相关博物馆的展览与俄罗斯相同博物馆中先住民族文化相关展示，其二者间决定性的不同点存在于历史展示之中。如果从结论说起的话，俄罗斯所强调的是：与其境内先住少数民族相关的、可与多数俄罗斯人共享的历史是纳入沙俄帝制统治之后的时代，特别应该共享的则是俄国革命和二战（大祖国战争）胜利的这段历史。于是，他们在此之前的历史则不被承认。这段需要共享的历史，在博物馆的“历史展示”中作为俄罗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被体现出来，而在先住民族的文化展示中其历史性的要素却完全不存在。换言之，俄罗斯认为其先住民族文化是属于那种没有历史的文化<sup>24)</sup>。

正如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民族学博物馆和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那样，在多民族文化不得不同堂共展的场合下，对各民族的历史背景进行充分展示是不可能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抽选出各民族文化的中核或本质部分，进而对其文化的特征加以强调展示<sup>25)</sup>。然而，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及阿穆尔共青城等地方都市的博物馆以及 Nizhnie · Khalbi 那样的村属博物馆中，如果对当地历史及先住民族文化进行展示的话，由于其展示范围有所限定，本应该能对先住民族

的文化及地域历史进行详细地展示。但是，我们在俄罗斯的博物馆中并没有看到这两者间的联系。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两地均建有甚为庞大的“乡土博物馆”；其展示基本由自然（动植物和矿物）、考古学、先住民文化及地域历史等四部分构成。在此笔者想引起重视的问题是，考古学、先住民族文化及历史三者间并没有相互的关联性。

在两地博物馆中，考古学展示是这样构成的：其开始于人类进化史、然后按照前·中期旧石器时代、后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及古典时代等时代划分。于是，尽管该地域的历史应该始于3世纪以后的时代，但考古学展示则表现为鞑靼文化、渤海文化、女真文化及金王朝文化等考古文物，并最终结束于12世纪。历史展示则始于17世纪沙俄哥萨克人对极东地区的探险和征服史，接下来分别是开始于19世纪中期涅韦尔斯科伊探险的第二次极东扩张所导致的极东统治（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两城市的建立）、一战至俄国革命时期、内战、苏大林时代、大祖国战争（二战）、战后复兴至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分裂以及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等连续的时间推移，其中对象征各时代的资料和档案类文件进行了展示。然而，这些都是以入殖的俄罗斯人为首的移民们的历史，其中并没有展现出先住民族的历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采用了这样的立场，即将先住民族包含于俄罗斯帝国臣民或苏联国民之中。

接下来，在完全不同的别室内是先住民的文化展示。但是，由于两处博物馆均以先住民族文化展示作为博物馆的核心部分，所以它们位于最醒目的场所、可以说是建筑物的中心位置。在那里挤满了先住民族的所谓“传统”资料类物品，并附有十分认真的解说。依据不同的展品还有明确记载制作者名称的资料（1980年代以后的新制品资料）。然而，在这三处展示中，并没有体现出彼此的相互关联性。

俄罗斯的考古学高度发达，不仅是史前时代，在中国留有大量史料的渤海、辽王朝及金王朝等时代，与它们相关的遗迹发掘也在蓬勃发展着（不仅局限于渤海、辽、金等时代，已扩展至元、明、清的版图中现已为俄属的地域）。由此，文献中无法了解到的、体现民众实际生活的珍贵资料在考古中则频繁出现，其本身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基于他们不懈的调查和研究，我们不得不全面的重新审视考古文物中所见的东北亚文化史：它不仅局限在阿穆尔河流域及沿海地方，亦包含日本列岛、库页岛、千岛列岛、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地区等诸多地域。

然而，即使是俄罗斯考古学者也有其难以跨越的界限。那就是他们所发现的数据无法与史料中的记载（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及满洲等地残留的历史档案等）完全吻合。加之，俄罗斯考古学者的发掘和研究截止于12世纪的地层。而在文献研究中，13世纪以后史料的数量和种类急速增多，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渐为人们所了解；而另一方面，无法通过实物资料对此加以体现的考古发掘，在13世纪以后的地层中几乎是无法完成的。

关于此，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理由。首先，地层过浅易受后世搅乱，且层位难以鉴定。第二，步入此时代后人们不再制作那些在发掘中易于被发现的低温陶器，加之竖穴式住居衰退而平地式住居成为主流，等等这些使得遗迹、遗留构筑物及文物等难以发现。这不仅仅出现在阿穆尔河流域，在包含库页岛和北海道等地的东北亚地区全境也属共通现象。第三，正如此，由于新时代的发掘事例十分罕见、时代推定的参照材料十分缺乏，使得即使加以调查也无法对那个时代的遗迹

进行判断。第四，由于俄罗斯的考古学者大部分无法阅读汉文、满文及日本语所书写的档案资料和研究著作，使得他们无法理解较新时代遗迹的调查意义，而且发掘的意欲也不是很强。在这些理由中，第二和第四点恐怕是挡在俄罗斯考古学者面前的巨大障碍（近些年，俄罗斯考古学者中学习中国语和汉文的年轻研究者持续出现，第四点可能会慢慢消解的）。

然而，这样的俄罗斯考古学局限性不仅对博物馆的展示，还会对人类学、民族学及历史学中先住民族研究带来相当程度上的损害。其原因是，由于无法对史前时代至19、20世纪的先住民族文化的连贯性地域史进行描述，便导致他们无法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所说明的“传统”民族文化的相关文化表象进行在史前时代以来地域自然史及政治经济社会史脉络下的相对化研究。

对于俄罗斯的人类学、民族学者来说（抑或是对全世界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来说），民族志中所描绘的阿穆尔河流域的先住民族的文化形象是超越时代而普遍存在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所调查时代与民族志所记录时代的特性（即时代性）。也就是说，他们坚信19世纪末至20世纪所调查、记录的内容是超越该民族文化时代的、本质或中核的部分。由此，后代的研究者也为寻求这样的内容而奔赴调查地域，而逐渐将目光局限于那些所幸保存下来的时代产物。尽管这样的调查和研究具备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忽视了经调查所挖掘出土的事物及现象背后所存在的自然的、人为的环境要素，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文化动态；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过程，即文化因各种环境因素而强有力地变化着、同时也使围绕其四周的环境要素不断变化。事实上，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状况作为民族文化的中核和本质加以理解、并对该部分持续探索的苏联民族学，在其所进行的西伯利亚研究中，研究者只能对他们所认为的“传统文化”的再构筑及其形成、毁坏的过程进行表面性的描述。所谓表面性的描述是指，在长期以来苏联民族学擅长的“民族起源论”和“民族形成过程论”中所进行的历时性研究当中，他们始终无法将文化与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史有机地结合起来。

“传统”民族文化地域史脉络中的相对化研究，即使在过去的那些参加过始于1990年代的西伯利亚和极东调查的西方各国人类学者中也是难以充分实现的。1990年代以后，出现了这样的研究：即在B. Grant的尼赫夫研究与Andrei V. Golovnev、Gail Osherenko二人所做的捏捏茨相关研究中，他们有效利用了此前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所忽视的历史资料，对其历史逐渐明了的现状进行了重新解释（Grant 1995; Golovnev and Osherenko 1999）。然而，尽管他们公开了苏联时代无法明确的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意义重大，即使这样他们的研究中也未能将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史方面的变化与文化的动态结合起来加以讨论。阿穆尔河流域、库页岛及千岛列岛等地区最需要使用那些着眼于环境变化与文化动态间关联性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该地区也聚集着该研究所需的资料信息。然而即使这样，欧美学者自不用说，连俄罗斯的研究者也没能加入研究的行列。这其中含有掌握资料所需要的研究者自身的语言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今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在对待地域历史和先住民族文化时所持有的认识和视野上的偏好所导致的吧。

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不了解文化所持有的时代性（依存于时代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特性），并将特定时代的文化界定为“传统”并将其绝对化下来，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影响

会波及到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学术领域，先住民族政策所产生的、出自多数派民族的一般国民对先住民族的印象和认识，以及先住民族的自我认识和对固有文化的意识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包括现代的日本在内，在那些拥有“先住民族”、“少数民族”人们的国家中，持续引人关注的与他们相关的社会性歧视以及他们所处的相对贫困的状态，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所创造出的形象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与他们相关的诸如未开化社会、原始社会，传统文化及自然民族等言论，已经在多数派民族出身的国民中灌输成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落后而需要援助的，抑或是那些无法生存于现代文明且正成为社会负担的人们。

而且，这种言论又进一步在那些先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里扎根下来，伴随着其所带来的排斥与自残，其中一部分则被人们冷静地接受下来并融入到他们的自我认识和见解之中。例如，现代那乃村落的博物馆展示中所体现的无疑是苏联民族学所构筑的那乃文化的本质主义内容；而且，其馆员们的解说基本上是引自苏联民族学所发表的民族志内容。然而，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从以往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的负面描述所引起的言论中选取那些更为正面的内容，并将其发展转化以用于自我宣传之中。例如，“自然民族”及“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等措辞，在主张自然环境保护的当下反而唤起了正面的印象。而且还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过去曾被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视为中核部分的“传统文化”也被重新评价为与自然调和的、或美丽优雅的文化而为人们所强调。鱼皮文化就是其典型范例。在过去，由于赫哲族、那乃身穿鱼皮缝制的衣服，他们在中国境内被蔑称为“鱼皮鞑子”、“鱼皮国”（杨宾 1985: 253）。然而，在现代社会“鱼皮画”成为了工艺品并被赋予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其现代社会的自身表象使得过去象征未开化的鱼皮提升到了更高的档次。另外，伊玛堪也是如此，它在以前仅被视为无文字的未开化社会的口头传承或艺能，现在则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即使这样，由于他们所存在的社会中还存有歧视和贫困，因此对他们的负面印象还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所创造出的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的印象，加之没有对其进行相对化反而是中核化、本质化的处理所造成的。

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所构筑的作为中核的、本质的部分的传统文化形象当然会给周边诸学科留下巨大的影响。例如考古学中因文物解释需要对民族资料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占多数的是对先住民族资料所进行的单纯的比较。所谓“单纯的”也就是指，围绕着表面形态和材质的类似、技能的类似、抑或是所制作、所使用的自然环境的类似等方面进行比较。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其往往会唤醒这样一种意识——即时常被用来比较的先住民族是那些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保有不变文化的人们或是仅达到石器时代生活、技术和脑力水平的人们，并使其在读者脑中扎根下来。

即使在相同环境中具有相同目的和机能的使用道具中，其形状和材质完全不同的现象也是很多的。它是由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特性所产生的差异导致的；不仅如此，该民族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也对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史前考古学并不了解这些，然而如果是拥有史料文献的历史考古学的话，通过文献的记述应该能够了解到这些道具所制作、所使用的时代性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进而，如果将这些文物相关的记述进行关联化并作为信息加以积累的话，如同我们可以绞尽

脑汁地归纳出特定自然环境下所使用道具的种类一样，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下其所使用的道具种类也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基于此，从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双方出发，我们便可明确文物的时代性以及文化的时代性，进而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对该时代的文化进行相对化处理。

远东俄罗斯考古学（这里所说的不仅包含俄罗斯研究者所从事的考古学，亦包含海外研究者们将极东俄罗斯作为调查地而加以研究的考古学），经常将文物及遗迹与历史文献进行对照，进而在对中世、近世和近代的遗迹所进行的积极调查中推进了上述操作的发展，消除了先住民族文化本质的“未开化”形象，因此，在民族志所描绘的先住民族像中存在着可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相对化处理的极大可能。然而在当下，上文中所谈及的俄罗斯考古学的局限性，其在长时间探寻之后又回到了原点，而相对于上述的那种可能性其在先住民族文化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很少。

同样的影响也产生在历史研究之中。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对于极东地区（包含阿穆尔河流域、沿海区域、库页岛、千岛列岛、堪察加半岛及楚科奇半岛等地）来说是征服、支配和统治的历史，却时常被概括描述成对中国和日本的暂时失败和决定胜利。由于历史研究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的产物，因此在其所使用的史料文献中会产生偏颇，片面的梗概描述中必然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性。然而，对俄罗斯的国家脉络进行理解的时候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其中并没有先住民族积极参与的余地。俄罗斯的历史，对于这些先住民族来说尚不是自己的历史，他们无法参与国家那样“高度”层面中文明集团的活动。对于历史来说，他们经常处于被动状态，即使被提及的话也仅被描述成暴政的牺牲者或善政恩惠的获得者。进而，人类学、民族学就是对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进行研究的领域，同时它还使人们形成这样的印象，即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对那些没有历史的时代中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进行研究的学科<sup>26)</sup>。

这应该这是由于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情况作为“传统的”状态而加以本质化理解所导致的。在当时的西伯利亚和极东俄罗斯地区，那些先住民族在俄罗斯近代帝国化政策的影响下被任意的塑造成“未开化民族”并贴上了标签，逐渐排挤和远离故土上的资源。这些资源在过去是极为珍贵的皮毛，近代以后则是木材、矿产及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以及其土地本身。近代政府自然是采用上述做法以便跨过先住民族直接将资源收至中央或加以管理。在无视此问题的情况下，将该时代状态作为传统的本质部分加以理解，这样的做法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政府任由这些先住民贫困下去、并使其处于一看便知的未开化社会状态之中；而他们自身则生活在空前绝后的富裕的“文明”生活之中。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看一下1850年代俄罗斯再度扩张至阿穆尔河流域之前的葛依克勒氏族人的状况便可知晓一二了<sup>27)</sup>。

总之，为了能够更正确地理解以阿穆尔河流域为中心的极东俄罗斯人的文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等相关诸领域间，国际合作、资料和信息相互比对以及每个文化现象其时代特性的关注等多方面汇总研究的进行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便可对前文谈及的环境和文化之间强有力的相互关系进行历时性理解，并将民族志所描述的先住民族文化相对化，进而使多数民族对他们认识的改变成为可能。然而，以俄罗斯为首的日本和中国等相关诸国，其当下的研究状态中还无法实现这一点，各国将先住民族文化从本国地域住民的意识中剔除出去，仅将他们极端地

视为异国的或未开化、野蛮的东西。而且，与其相关的还有先住民族工艺和作为观光资源的消费活动进展缓慢。

在这样的情况下，敖其村的博物馆展示，尽管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将地域文化史与先住民族文化编织在一起，从史前时代至现代进行了连贯说明，并展现了与其相关的实现方法。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是，该馆的历史展示是以该村主要的赫哲族—葛依克勒氏的历史为支柱而构成的。以17世纪初期以来史料中出现的该族历史为依据，对赫哲族的历史与地域史进行说明，由此将赫哲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地域文化史中进行相对化处理，进而使得各时代文化的复活成为可能。

当下的展示还有一些不彻底的地方，这是历史展示与文化展示间的彼此脱离所造成的。换言之，葛依克勒氏族人历史活动的介绍说明与白桦树皮工艺和鱼皮服装、狩猎用品和渔具以及萨满教用品和占卜用品等资料展示，这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协调感。这主要是因为，后者依然受到源于“非文明的”、“生于自然”的文化理念的强烈影响。

理想的情况是，葛依克勒氏流传下来的遗物以及表明他们在三姓副都统衙门中地位的档案（如果没有实物的话相片亦可）等使历史展示部分得到强化的同时，再将该族人隶属于正黄旗牛录时代所使用过的农具、狩猎具及渔具等道具以及与祭祀有关的资料的实物、照片或仿制品进行展示的话，两者的关系便得到了拉近。另外，二楼所陈列的与毛皮交易（毛皮标本和狩猎用具）和渔业（鱼的标本和模型船）相关的展示，能够与葛依克勒氏的展示相关联并进行展览的话，便能使人们了解到该族兴旺的经济基础。葛依克勒氏以渔业作为食材基础（并入牛录后，因获得旗地亦从事农业）的同时，通过以黑貂为支柱的皮毛贸易而与清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在加入作为军事、行政基础的八旗组织之后，其地位逐渐上升并成为了该地区的势力强者。他们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同样是与该族的成长和衰退一起变化发展的，如果其能够在文化展示中加以体现的话，它将不再是以往人类学和民族学所主张的“未开化文化”或“融于自然的文化”，而在展示中其完全有可能表现出全新的文化形态。

考古学展示和历史展示同样，如果能够留意此二者的关联性并加以展示、进而将文物和历史档案与葛依克勒氏的历史联系起来的话，便能将从古至今连贯的地域史展现出来。由此便可诞生出本质主义部分与现代部分相融合的文化展示——即，狩猎、渔业活动与鱼皮、桦树皮等“传统”素材所制作的服装和生活用品，与由其而生的工艺品和现代艺术一起共同展现出来。这些并不是赫哲族从史前时代以来就保有的永久不变的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和发挥，而是经过相当长历史积累的渐次成熟的文化所孕育出的现代工艺和艺术；关于这一点，参观者们应该能够越发明确地加以理解吧。

另外，如果考虑到中国国情的话，以葛依克勒氏为首的赫哲族族人，他们自古代开始便与各种各样的中国民众共享相同的历史进程；因此，对于造访此村的观光客来说，亦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他们会感受到与自己文化、作品更贴近的切身体会。同时，其也会促使工艺品销售量的增长和观光收入的增加吧。

而俄罗斯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乃艰难生存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并与其共享相同的历史，尽

管存在这样的事实，但是不仅是政治层面、在研究层面上这些在俄罗斯都是不被承认的。历史事实是，俄境内那乃的祖先曾经被编入清朝的边民制度（毛皮贡纳民制度），而且其一部族人加入了满洲八旗甚至挤入了清政府的中枢机构之中；相较于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统治，清朝对黑龙江的统治则更具实效性，甚至对住民文化、社会基础部分等都都有所约束。例如，他们社会组织之一的哈拉（氏族），并不是自然发生的社会组织，而是清政府行政性规定、登录的产物，其至今在许多那乃中仍作为“姓”（фамилия）而存在着。另外，对于了解他们信仰和世界观不可或缺的、被称为“庙”的描绘精灵群的圣画像以及写有其汉字名字的布片等等，这些在1970年代之前都是从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国裔居民那里定制的（佐佐木 1990: 25）。然而，在俄罗斯境内不仅普通民众，就连包括民族学者和历史学者在内的研究者们也对此事实毫不知晓。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想参照那些保留在中方的关于那乃的资料，同时还不愿意直视那些经过田野调查就肯定会发现的事实。

笔者是这样认为的，对于那乃来说，明确他们在中国史中的生存时代（特别是元、明、清三朝——那些被认为是他们祖先的人们在史料中出现、同时在考古学遗迹中已无法再现的时期）并准确地认识他们，通过这些做法难道不能使他们了解自己所不知的过去并且重拾对“那乃”民族及其文化的自豪感，同时还能对其文化的复兴和振兴起到一定的贡献吗？在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方城市的博物馆历史展示中对先住民族的历史进行彻底展现的话，由于参观者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所以这样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将先住民族文化承载于考古学资料所还原的文化史的文脉中，这样的做法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将先住民族文化置于地域文化的历史中（并不是俄罗斯史），并抹去那些十分容易陷入的偏见——他们是“史前时代以来生活着的人们”。由此，寻找、调查那些公认是难以发现的13世纪以后的遗迹和遗留构筑物并与档案记录相互参照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该村的博物馆和资料馆来说，它们担负着成为教育村落子弟和文化活动中心的重要使命；因此，对村落周围所发掘出的考古资料以及与该村相关的历史资料加以收集和展示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这一点再怎么说不为过。由此，将过往的民具及文化资料视为该村历史的展示资料是同样十分必要的。该村的生活和文化是随着时代状况而灵活变化着的，诸如过去的生产用具和宗教用具、现代的传统工艺作品和音乐演奏等，这些发展于他们厚重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内容通过展览得以体现的话，这是人们所希望的吧。由此，为理解该村博物馆的理想状态并使其在展示和博物馆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将活用中俄两方资料所得的、与地域和该村历史相关的认知传递给俄境内的那乃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那乃、赫哲族历史和文化相关研究者的使命吧。

## 结语

在几乎不为中国东北地区人类学、民族学者所知晓的敖其村，我们在该村博物馆中发现了葛依克勒氏族——研究者们几乎对其不甚了解；本文便从该族来历相关的展示出发，从博物馆中民族文化的展示方法及先住民族文化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尝试。由此，该问题的形成源



自于，正如“序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乃或赫哲族相关的历史学研究与民族学研究的描述之间，我们无论如何都能感受到的那股并不算好的不协调感所导致的。同样的不协调感也出现在笔者身赴中俄调查时所见村民们的谈话、举止及其私有的精美丝织物与地方都市和村落中博物馆的展示之间。

这种不协调感的本质是，基于疏远于历史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者的偏执观念所创造出的文化表象与史料中载有姓名和功绩的人们的实际行动之间的偏差；亦是，田野调查中将文化作为集团属性加以理解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与将史料中个人级别的行动进行单独把握的历史学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所属同一集团并具有相同文化的人们，与他们相关的文化像——将个体行动堆积起来而呈现出的集团文化像与初期便从集团级别进行总括说明的文化像，这两者间存在着差异。

同时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史料中出现的、同一集团中属于地位较高的个人，在民族志中被当作集团成员时其地位大致都很低。然而，本稿所涉及的以葛依克勒氏为代表的那乃氏族集团则属于这样的一群人们：不管其亲族关系是否明确，只要姓葛依克勒氏就可互认同族并汇聚于亲属关系之中。从而，在为了总括说明某一集团文化而撰写的民族志中，由于他们的处于很高地位而且拥有优质的文化（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而得到了评论）而对此部分加以省略的话，这种研究态度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这样说，用俄文和中文撰写的、抑或是由英语或日语等翻译普及的以往的那乃和赫哲族民族志中，在这一点上就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笔者研究的目的，就是将通过历史研究所获得的个人事迹、其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像融入进上述那样的民族志之中，进而构筑出多面的民族文化像。

在始于1990年代的阿穆尔河流域调查中，笔者便通过田野调查对史料所隐含的实事加以确认，同时还逐渐积攒着那些应该添加进既往民族志中的实事；另一方面，2012年黑龙江省的调查、特别是最后在敖其村的调查，使笔者得以发现那些与葛依克勒氏历史相关的、已经探求很久的断裂缺失部分。本文是这样研究的一部分：将已成为笔者一生研究的、运用史料的历史研究与通过田野调查的民族学调查进行融合，进而重新审视包含更广泛的阿穆尔河先住民族文化的文化表象。

作为结论笔者想强调的是，人类学和民族学都应对时间线加以关注，不仅是民族志其自身调查也需要时常注意时代性（受现时代所拘束的特性），与此同时还必须要进行数据的分析。尽管民族志也算是史料的一种，然而特定时代的调查所做成的民族志中所描绘的文化像，如果不能将其置于那个民族或集团所处地域的历史中并加以相对化研究的话，便不能将其作为史料而加以使用。历史学中所进行的史料批判同样在“民族志批判”的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然后，经过如此过程将民族志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运用其他史料对记述其间的文化事象有所约束的时代性加以不断明确，再从该时代的文化、同时代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所创造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三者相互作用的关联出发，对特定集团乃至民族文化进行历时性的、涵盖式的理解。人类学与民族学中的历时性研究，即所谓的文化史研究，也就是运用上述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吧。而且，在民族学博物馆内的民族文化展示中，也如同这种历时性、涵盖式的理解所反映的那样，所展示的实

物资料和影像中存在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于当今其所展现出来并介绍给参观者的内容来说存在着怎样的意义，等等这些通过解说文章和演示方法进行明示是十分必要的吧。

那乃、赫哲族文化中与葛依克勒氏相关的内容被人们构筑成怎样的产物以及他们分别具有怎样的文化等等这些，我们能够从档案记录与口头传承、以及敖其村博物馆的展示中得到足够的了解。该氏族在清代分裂成两个集团，留居松花江流域的集团以三姓地区为据点活跃于三姓副都统衙门和正黄旗的八旗组织之中，并从中涌现出位及佐领、协领及副都统等高官的人才。他们使用汉字和满文、理解汉语和满语，并在清朝的东北政策中担负起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清朝灭亡后他们离开了三姓地区并在敖其安居下来；他们中也出现了抗日战争中的领袖人物。

另一方面，与他们分别后前往阿穆尔河下游的集团则在阿纽伊河流域过上了毛皮贡纳民的生活，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着更下游的地区扩散并最终在那乃最下游的聚居地 Ади 村附近定居下来。他们掌握了与乌尔奇相邻下游地区的那乃语言和文化，并且将成为附近地标的巨石与自己的传说结合了起来。然而，在他们中间仍残留着与中国满族贵族地位相当的意识，并且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为了满足贵族们的要求而迎娶满洲贵族出身的新娘（Сацаки 2008: 70）。

笔者试图对那乃、赫哲族的文化进行历时性、涵盖式的理解，由此就应该对属于他们的其他氏族进行同样的来历研究。然而，所有的氏族并没有像葛依克勒氏那样出现于刊行的史料之中，因此，在未出版的史料（档案或资料等）中仔细寻找新资料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对那乃、赫哲族文化进行多面并动态的理解所必须进行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样的理解对于其他民族集团，例如那乃的近邻乌尔奇、乌德盖、尼夫赫、鄂罗克以及阿伊努等文化的相关研究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庞大数量的考古学发掘的事例、遗迹及文物等相关资料的积累，多种语言撰写的多种史料，以及相当程度的民族志记述的残留，等等这些与阿伊努文化相关的内容，在阿伊努人和日本人的共同研究下必然会进入理想的实现阶段。

## 注

- 1) 本文是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A 海外学术调查 (JP21251013)《俄罗斯极东森林地区文化的环境适应》(代表者: 佐佐木史郎, 2009~2012年)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机关研究《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代表: 韩敏, 2012~2015年)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笔者在后者所举行的第2次国际会议“中日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刷新与田野调查”(2013年11月18日~19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中所做的报告正是基于本稿而来的。本稿是在笔者执笔的日文稿的基础上翻译修改而成(佐佐木史郎 2015「北東アジア先住民族の歴史・文化表象——中国黒竜江省敖其村の赫哲族ゲイケル・ハラの人々の事例から」『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 2015 39巻 3号』pp. 321-373)。
- 2) 在本稿中,笔者对中国境内的“赫哲族”称为“赫哲族”,因为这是中国官方的民族名称。而对于俄罗斯境内的那乃来说,笔者并没有使用其它的民族名称来形容,因为会产生歧视和侮蔑的感觉。
- 3) 以下的著作可以作为那乃、赫哲族民族志的基本文献: Шренкь (1883; 1899; 1903)、Шимкевичь (1896)、Laufer (1902)、Штернберг (1991[1933])、Лопатинь (1922)、Lattimore (1933)、凌纯声 (1934)、赤松·泉 (1938)、Сем (1973) 等等这些均可入选。然而,在此所引用的主要文献,除了 Шренкь (1883) 的

著作之外，其他的著作中历史记述很少。Шренкь甚至使用到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献对解名历史缘由，就这一点而言他相比较其他作品更胜一筹。步入新时代，Березницкий и др. (2003)、黄泽·刘金明编 (2004)、黄任远 (2006)、黑龙江省编辑组编 (2009) 等作品相继问世；尽管他们对不再将赫哲族、那乃人当作未开化社会而加以描述，但是他们在对若干历史进行记述的同时，在对民族志或者现代社会所体现出来的状况并没有进行历时性的相对化尝试。

历史学研究中有关松浦茂所作的关于清朝在黑龙江统治的一系列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由2006年京大出版会归纳后合册出版，使人们能够总结性的加以阅读。尽管从人类学的见解来看存在许多问题，对于了解赫哲族—那乃人的历史、或17至19世纪阿穆尔河及库页岛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来说是最好的著作。

- 4) 笔者利用了下记研究项目所提供的调查机会，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先住民族的历史及其历史意识进行了相关调查。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海外学术调查 (JP63041002) “中国内蒙古鄂温克族语言文化的实地研究” (1988~1990年度，代表者：黑田信一郎 北海道大学助教) 中所做的调查 (1990年1月5日~3月1日、1990年7月15日~8月11日)；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国际共同研究 (JP09044003) “俄罗斯极东少数民族自然集落相关的国际共同研究” (1997~1999年度，代表者：藤本强 新潟大学教授) 中所做的调查 (1997年9月15日~9月29日、1998年7月31日~8月17日)；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金研究B (海外学术调查) (JP13571036) “俄罗斯极东地方自然环境和传统生业相关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2001~2003年度，代表者：大贯静夫 东京大学教授) 中所做的调查 (2001年8月8日~26日、2002年7月20日~8月22日)；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 (JP14083207) “资源人类学” 计划研究班07 “生态资源的选择利用及其象征化过程” (2002~2006年度，代表者：印东道子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 中所做的调查 (2005年8月11日~9月1日)；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金研究A (海外学术调查) (JP21251013) “俄罗斯极东地区文化的环境适应” (2009~2012年度，代表者：笔者) 中所做的调查 (2009年8月17日~31日、2009年10月2日~12日、2010年7月26日~8月9日、2011年8月12日~9月4日、2012年11月29日~12月9日)。本文即是在这些项目的研究积累上撰写而成的。笔者在此真诚地感谢那些曾为我提供数次阿穆尔河调查机会的项目代表者 (尽管有几位已经故去了)，以及那些曾热情地欢迎笔者并提供调查帮助的调查地村落，特别是曾给我集中帮助的Kondon、Ulika·Natsionalnoe、Nizhnie·Khalbi、Naihin、Dayerga 以及敖其村等的各方村民。
- 5) 在近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国情调查中，中方有赫哲族4,500人左右，俄方的那乃人则在12,000人左右。这固然是自我申告的结果，然而别说那些以赫哲语、那乃语为母语的人们了，就连多少懂得一点的人们其比例也是很低的。
- 6) 从俄境内的那乃人来看的话，其间可感受到这样的不协调感：中国境内的赫哲族居住在“上游”地区，却使用表示下游居民的“赫哲”(Heje) 名称。俄境内的那乃语中，将在上游的松花江、乌苏里江以及库拉·乌尔米河等流域居住的人们成为“Akani”。
- 7) 有人指出赫哲族和那乃间存在着语言的差异。在赫哲族的语言赫哲语中存在着赫真方言和奇勒恩方言 (安 1986: 1)；前者被认为与俄罗斯境内的阿穆尔方言 (特别是上游地区的方言) 存在着同一性，而后者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语言。通古斯语专家风间伸次郎认为，这种奇勒恩方言与俄境内那乃中生活在库拉河、乌尔米河流域的人们所使用的方言相近 (風間 1996: 134-135; 1997: 114)。该地区的人们被 Шренкь 划分为称作“Kile”的独立民族集团 (Шренкь 1883: 34-35)，并且他们被 Патканов 等后续研究者重新划分为那乃中的一个方言集团 (Патканов 1906: 61)。他们往来于松花江流域，亦存在尤姓及吴姓两者间的共通氏族 (那乃氏族)，库拉·乌尔米方言与奇勒恩方言间近缘关系的或然性很高。然而，步入20世纪后两者的交流便逐渐困难，因此无论是尤姓族人还是吴姓族人都不知道这样的事实：即，在中俄境内共同存在着拥有相同姓氏的人们。
- 8) 在18世纪分为剃发黑金、不剃发黑金 (杨宾 1985)，而后在19世纪后期则分为短毛子、长毛子 (曹 1885 [1985])。所谓“剃发”与“不剃发”、“短毛”与“长毛”，其不同点之处在于是否将额至头顶部

的头发剔去。也就是说，被称为“剃发”或“短毛”的人们，将额至头顶部的头发剔去，再将剩下的头发留长并编成三股辫；这种发型曾遍及满洲至蒙古。而不剃发或长毛指的是这样的发型，即将头发编成三股辫，但并不将头上的头发剃掉。亦可参注11。

- 9) 例如，1714年（康熙53年）将当时的赫哲族人编入八旗（长顺编、李桂林纂《吉林通志》1930 [1986]: 1032-1033）；《清实录六·圣祖仁皇帝实录三》1985: 548），1732年（雍正10年）闰五月又将赫哲的他部、称为“八姓”的人们编入八旗（长顺编、李桂林纂《吉林通志》1930 [1986]；《清实录八·世宗宪皇帝实录二》1985: 579；松浦 2006: 319-324）。然而，被编入八旗的人们的居住范围并不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点更下游的地区、而是那些居住在更上游的人们，或许曾居住在今黑龙江下游的人们并没有被当作八旗的编入对象。
- 10) 然而，将辫发周围的头发剃去的发型表明了他们受满族人的统治，并将自己视为与此相近的、清帝国一员的意识，而这对于在清代社会的生存是十分重要的。其原因可能是，清朝在对华进行征服的时候所颁布过的著名的“剃发令”。它也被认为是使用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等这样标语的过激产物。19世纪初期的剃发发型曾扩散于比 Шренкь 所认定的那乃下限区域阿吉以及曾设立了满洲行署的德楞等更远的下游地区，并最终到达乌尔盖村（译者音）（Шренкь 的时代称为 Ыри，在今马克西姆·高尔基村附近）（间宫 1810 [1985]: 131）。比那更下游地区则不再有剃发之人了。于是，这些不剃发之人（事实上是现在的乌尔奇和尼夫赫人的祖先）并没有接受清朝的统治，同时毛皮贡纳与获取恩赏也只能作为商业活动的一环来加以理解（佐佐木 1998: 753）。
- 11) 参加此次调查的研究者如下：佐佐木史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研究代表者）、佐藤宏之（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思沁夫（大阪大学 Global Collaboration Center 准教授）、梁松（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侯儒（黑龙江省大学职员）、Sergei Berezniisky（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Andrei Samar（俄罗斯科学院极东支部极东诸民族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 Yury Latushko（俄罗斯科学院极东支部极东诸民族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等。其中，梁松与侯儒是中国赫哲族，Andrei Samar 是俄罗斯的那乃出身。笔者在此真诚地感谢本次调查中上述各位所给予的调查协助。
- 12)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所制造的铁道爆炸事件。声称其为中国军所为的关东军对东北地区全境进行了军事压制并建立了“满洲国”。该事件也开启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并成为了历时15年的中日战争的开端。
- 13) 与此相同的内容在《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记载为：“戊子，东方格伊克里部落，四头目卒四十人来朝，赐宴立赐衣各一裘”（《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1985: 56）。（下划线为笔者做）。
- 14) 关于太宗统治的天聪、崇德年间（1627~1643年）葛依克勒氏族来朝的内容，《清实录·太宗实录》中有如下记载：（下划线为笔者做）
- 1635年（天聪9年）正月：“使犬部落索锁科来朝，贡黑狐黄狐貂鼠水獭等皮及狐裘貂裘”（《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1985: 287）。
- 1637年（崇德2年）2月：“虎尔哈部落、托科罗氏、克益克勒氏、缠野勒氏头目率六十人，至盛京，贡貂狐皮等物”（《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1985: 438）。
- 1638年（崇德3年）11月：“虎尔哈部落、克宜克勒氏、达尔汉等十三人，虎习哈礼氏、纳木达礼十人、赖达库四人来朝，贡元狐黄狐貂鼠青鼠海豹皮等物。”（《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1985: 587）。
- 1640年（崇德5年）正月：“赐贡貂东方克宜克勒氏布珠、锡希尼吹纳，及布珠妻、精达礼妻、布克腾妻，与同来五十三人，蟒衣、帽、鞞鞞带、布匹器用等物、有差”（《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1985: 668）。
- 1641年（崇德6年）12月：“东方巴牙喇、脱科洛、努牙喇、黑叶、马尔遮赖、科尔佛科尔、克宜克勒、库萨喀里、八姓头目、遣董纠等来贡貂皮赐宴赏衣、帽、缎、布等物、有差”（《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1985: 793）。

1643年（崇德8年）2月：“赐贡貂皮虎尔哈部落精德里额驸等十三人，衣服、帽、鞞鞞等物、有差”（《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1985: 883）。

下线处所强调的“格伊克里”、“克益克勒”及“克宜克勒”等均是“葛依克勒”相当的词语。尽管在1635年正月和1643年2月的记录中，还没有与“葛依克勒”相当的名称出现；笔者认为前者所载的“索锁科”应该就是葛依克勒氏族人“索索库”，而后者中的“精德里”应该与1640年（崇德五年）记录中所载的“精达礼”是同一个人，所以记录中认为是葛依克勒氏来朝。

- 15) 《满文老档》中出现的与“使犬国”Yendahūn Takurara gurun 相同种类的名称，属于那些掌握了以狗拉雪橇为主要交通运输手段的人们。其所指代的范围或许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汇流地下游，并大致截止于格林河汇流处的相关地域。
- 16) 曾位于牡丹江中游的城市，是当时清朝对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流域进行统治的据点。库里哈活跃之时虽然驻留有宁古塔将军，但是将军衙门于1676年迁至吉林，此后便成为了一个地方据点。
- 17) 亦称奉天，现在为沈阳市。太宗时代之前为清廷所在地，1644年清进军至中国本土后驻留有盛京将军并成为统治东北地区的最大据点。太宗时代之前的宫殿则作为“沈阳故宫博物馆”保存至今。
- 18) 由七个姓氏所构成的地方民众。他们大致居住在乌苏里江至黑龙江一带。然而松浦认为，在《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之外的资料中载有“八姓”，详记为 Urgungkere, Namdulu, Gufatin, Kiyakara, Horfokol, Muliyalayan, Sinulhū 及 Bira 等八姓（松浦 2006: 321; 323）。
- 19) 雍正9年间七姓或八姓的调查也见于《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之中（《清实录八·世宗宪皇帝实录二》1985: 458）。《依兰县志》中则载有：“雍正九年，特旨派招抚霍尔佛阔八姓人丁归旗当差着有勤劳，奉旨赏穿黄马褂留京充一等侍卫”（《依兰县志》1921 [1974]: 148）。
- 20) 确实存在过三姓驻防正红旗世管佐领托精阿这个人。然而，在《吉林通志》65卷“职官志”的三姓佐领一览表中，1769年（乾隆34年）他从父亲穆克德恩保哪里继承了佐领一职（“穆克德恩保子，任一牛录世管”），并于1793年（乾隆58年）将佐领之职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额勒锦（长顺编、李桂林纂《吉林通志》1930 [1986]: 1035-1036）。间宫林藏造访德楞的1809年（嘉庆14年、文化6年），托精阿已正式退职并且年纪很大了（继任佐领后已有40年）；尽管如此，这位从三姓副都统衙门隐退的元佐领应该是被派遣至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等地的毛皮贡纳民那里去了吧。
- 21) 例如，乾隆56年（1791年）11月5日的档案中记载着如下一节。“geiker hala. sira gašan tofohon boo, šahūn ulgiyan aniyai tofohon seke be sijigiyan eture tulhina benjihe. sira gašan juwan ninggun boo, šahūn ulgiyan aniyai juwan ninggun seke be gašan da lioge, sijigiyan eture kila benjihe（《三姓档案》1791: 421-422）。”译为：“葛依克勒氏。Sira村，15户，辛亥年穿袍人Tulhina送来15枚黑貂皮毛；Sira村，16户，辛亥年村长Lioge和穿袍人Kila送来16枚黑貂皮毛。”这里的穿袍人sijigiyan eture指，拥有身穿缎织朝衣（缎袍）权利的人，在毛皮贡纳民中其仅次于氏族长hala i da和村长gašan da位列第三。由于他们多为氏族长和村长的子弟，故也称为子弟deote juse。
- 22) 如果考虑到以氏族外婚制为原则的那乃婚姻制度的话，葛依克勒氏所属的女性过多而其他氏族的女性则过少。与葛依克勒氏男性结婚的其他氏族出身的女性，在调查时可能按照俄罗斯风俗以丈夫的姓氏作为回答，这也是有可能的。
- 23) 有关伊玛堪(imakan)请参照孟慧英(孟 1998)和黄任运(黄任运 2006)的研究。
- 24) 然而，在俄罗斯，以俄罗斯人为首的欧系民族文化相关部分，其历时性在民族学博物馆的文化展示中同样被进行了舍象处理。也就是说，将各民族文化的内核及本质部分加以表现过程就是民族文化展示，而它往往被看成是超越时代制约的。在许多场合中所实际展现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所使用的资料，因此其时代的时代性并没有表现出来。由于这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的内容，人们便决定在这种资料中寻找各民族文化的内核部分或本质。
- 25) 这其中存在着两种情况：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筛选或者是根据被展示民族的要求进行筛选；近年

来两者相互合作进行筛选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关于后者，Duncan F. Cameron于1970年首次提出了“作为公共论坛的博物馆”（Cameron 1972: 189-202）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作为民族学博物馆展示理念的发展一环在欧美及日本等地得到了屡次尝试。然而，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事例亦是如此，在许多场合如果要对作为公共论坛的博物馆加以展示的时候，在体现被展示方的文化中核部分的同时，也会尽可能对他们的实际状况加以表现。由此，那些展示文化中核部分的民族学博物馆再也不能无视展示资料的时代性并制作相关展示了。

- 26) 旧苏联时代的1930~40年代，在苏联历史系诸领域间产生了围绕着民族学地位的争论；相对于历史学，民族学被赋予了这样的地位：它是对那些可还原史前时代社会的资料加以提供的学科——这也是束缚于意识形态的时代所致。尽管这种束缚在日后逐渐缓解，然而在苏联时代中这种后遗症仍然存在（Slezkin 1992; 桥本 1993）。
- 27) 日本在对北海道、库页岛以及千岛列岛的阿伊努人也实行过这样的政策：即将先住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界定为原始、未开化并将其片面认定为简陋贫穷的，然后为了其生活改善而推行保护政策和同化政策（以向近代社会或近代文化同化为目标）。一直以来，人们大多认为此问题存在于这样的情况中：由于殖民、开发政策以及强制移居等使他们逐渐远离那些曾经作为生活基础的资源（用于狩猎渔捞采集的资源）；然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他们的实际贫困不仅是因为被排挤于资源之外，还源自于“未开化社会由于文化落后而贫穷”等这种遍及全国的言论所产生的歧视和偏见（佐佐木 2013: 23-44）。

## 参照文献

(中文)

安俊

1986 《赫哲语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曹廷杰

1885[1985] 《西伯利亚偏纪要》转自丛佩远、赵鸣歧编《曹廷杰集》上，北京：中华书局。

长顺编、李桂林纂、李澍田等点校

1930 《吉林通志》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30年重修、1986年长白丛书所收）。

傅恒编

1761 『皇清職貢圖』瀋陽：遼瀋書社（1991年影印）。

黑龙江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

2009 《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

黄任运

2006 《赫哲绝唱：中国伊玛堪》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黄泽、刘金明编

2004 《赫哲族：黑龙江同江市街津口乡调查》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编译

1984 《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阳：辽阳书社。

凌纯声

1934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孟慧英

1998 《萨满英雄之歌：伊玛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实录（太宗实录）

1985 《清实录二·太宗文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

## 清实录（世祖实录）

1985 《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

## 清实录（圣祖实录3）

1985 《清实录六・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北京：中华书局。

## 清实录（世宗实录2）

1985 《清实录八・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北京：中华书局。

## 杨宾

1985 “柳边纪略”，《影印辽海丛书》pp. 235-272，沈阳：辽沈书社。

## 杨步犀纂修

1974[1921] 《依兰县志》（《中国方志丛书》东北地方第35号）台北：成文出版。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1981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

## （日文）

## 赤松智城、泉靖一

1938 「赫哲族踏査報告」『民族学研究』4(3): 384-405。

## 風間伸次郎

1996 「ヘジェン語の系統的位罫について」『言語研究』109: 117-138。

1997 「ツングース語の方位名称について」『北海道立北方民族博物館研究紀要』6: 113-124，網走：北海道立北方民族博物館。

## 佐佐木史郎

1990 「アムール川下流域諸民族の社会・文化における清朝支配の影響につい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14(3): 671-771。

1991 「アムール川下流域住民の民族構成の研究に関する覚書」『民博通信』51: 36-56。

1994 「松花江におけるエスニックな出会い——フルハ部ゲイケル・ハラの軌跡」黒田悦子編『エスニックな出会い』pp. 263-288，東京：朝日新聞社。

1998 「18, 19世紀におけるアムール川下流域住民の交易活動」『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22(4): 683-763。

2001 「近現代のアムール川下流域と樺太における民族分類の変遷」『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26(1): 1-78。

2011 「ヘジェ・フィヤカ・エゾ——中国と日本の北方民族に対する認識とエスニシティの形成」佐々木史郎・加藤雄三編『東アジアの民族的世界——近代以前における多文化的状況と相互認識』pp. 178-211，東京：有志舎。

2013 「一九世紀の国境策定と先住民——アムール、樺太、千島における日口中のせめぎあいの中で」『東アジア近代史研究』16: 23-44，東京：ゆまに書房。

## 柘本哲

1993 「レニングラード民族学派——クレイノヴィチを育んだ学問的土壌」E. A. クレイノヴィチ『サハリン・アムール民族誌——ニヴフ族の生活と世界観』柘本哲訳，pp. 378-395，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 間宮林蔵（口述），村上禎助（筆記）

1810[1985] 「東韃地方紀行」洞富雄、谷澤尚一編注『東韃地方紀行他』東京：平凡社。

松浦茂

2006 『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

満文老檔研究会訳註

1959 『満文老檔』IV 太宗 1, 満文老檔研究会訳註, 東京：東洋文庫。

(俄文)

Березницкий, С. В. и др.

2003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нанайцев: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Левин, М. Г. и А. П. Потапов

1954 *Народы Сибири.* Москв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Лопатинь, И. А.

1922 *Гольды Амурские, Уссурийские и Сунгарийские: Опыт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изслѣдовані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е отдѣление приамурскаго отдѣла русска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атканов, С.

1906 *Опыт географии и статистики тунгусских племен Сибири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данных переписи 1897 г. и друг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часть II, прочие тунгусские племена,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русска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этнографии, том XXXI, часть II),*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912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показывающие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Сибири, язык и роды инородцев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д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разработки материала переписи 1897 г.)* том III. 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 Забайкальская, Амурская, Якутская и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 и о. Сахалин.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русска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статистики том III, вып.3),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асаки, Сиро

2008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е браки кор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 и Сахалина.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8* No.2(60): 64-74.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ДВО РАН.

Сем, Ю. А.

1973 *Нанайцы: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середина XX 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Шимкевичь, П. П.

1896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зученія шаманства у гольдовъ.* Хаваровскъ: Типографія канцеляріи приамурскаго генераль-губернатора.

Шренкъ, Л. И.

1883 *Объ инородцахъ амурскаго края.* томъ 1, Санктъ Петербургъ: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академія наукъ.

1899 *Объ инородцахъ амурскаго края.* томъ 2, Санктъ Петербургъ: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академія наукъ.

1903 *Объ инородцахъ амурскаго края.* томъ 3, Санктъ Петербургъ: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академія наукъ.



Штернберг, Л. Я.

1991 (1933) *Гиляки, орочи, гольды, негидальцы, айны: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Я. П. Алькор (Кошкина). Хабаровск: Дальгиз (Токуо: Nauka Reprint)

Смоляк, А. В.

1975 *Этн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народов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 и Сах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参照史料

三姓档案

1791 《三姓档案》卷70 (乾隆56年) 辽阳: 辽宁省档案馆。

ДАИ том3

1848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акт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собранным и изданным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ей*, том 3.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Русская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英文)

Cameron, Duncan F.

1972 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1): 189-202.

Golovnev, Andrei V. and Gail Osherenko

1999 *Siberian Survival: the Nenets and their 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rant, Bruce

1995 *In the Soviet House of Culture: A Century of Perestroik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ttimore, O.

1933 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 *Memoirs of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40: 1-70.

Laufer, B.

1902 *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Amur tribe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 7. New York: Knickerbocker Press.

Slezkin, Yuri

1992 The Fall of Soviet Ethnography, 1928-38. *Current Anthropology* 32(4): 476-484.